

大家
人生

问问自己

张抗抗◎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问自己 / 张抗抗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8
(大家人生)

ISBN 978-7-5387-3687-8

I. ①问... II. ①张... III. ①张抗抗—回忆录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490号

出品人 陈琛
选题策划 赵岩
责任编辑 魏洪超 陈秋旭
装帧设计 孙 俪
排版制作 陈 萍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问问自己

张抗抗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300千字 印张 / 17.25

版次 / 2011年11月第1版 印次 /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自序

回忆往事是痛苦的，这意味着要将岁月残留的记忆——那些被一次次无法躲避的风暴和雷电击碎的，并已嵌入我的身体和心灵中的弹片，连血带肉地撕揭下来，一片片一丝丝，再重新缝合成一个似是而非、似我非我的人形。

我想，那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我。

人——会遗忘、会矫饰、会回避、会妄想。通常，我们遗忘的是平淡，矫饰的是弱点，回避的是错误，妄想的是快乐。所以，当我不得不开始这一项我本不愿做，却又是必须做的事情时，我才真正发现——人要正视自己是多么困难。

是否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才会出现那句叫做“青春无悔”的话语？轻松靓丽、俯拾即是、众口一词，就像在这些年间流行的时尚用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我的一篇短文被一家报纸转载时，编辑将此文安上了一个“青春无悔”的大字标题。然而，在此以前我从未使用过这个时髦的词组，我不知道那位编辑究竟是由于年长还是过于年少。这个赫然入目的标题使我久久疑惑，我一次次地反问自己——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青春、时间和生命，真的是能用“青春无悔”这般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但人们往往没有勇气否定自己，我们曾激烈批评的都是别人的历史。当父辈们的青春岁月被退潮的海浪席卷得踪影杳杳之后，我们在兔死狐悲的恐惧中，开始本能地挣扎，拼命想为自己留出一块容身的礁石。如果失去了这最后的营盘，我们的灵魂就将四处游荡无所归依，而沦为世纪末活生生的殉葬品。我们不愿不肯不忍也决不能承认自己的人生有一大块空白，因为，我们不再有填补这空白的时间了。我们只能以曾经有过的“荣耀”和“辉煌”，来支撑、慰藉那一颗颗苦涩的心。

如此的自欺欺人，其实同我们所批评的上一辈人，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

我们若是“青春无悔”，那些本应该向我们忏悔——制造了专制与愚昧、牺牲与残害了这一代人的那些人，岂不是轻易地逃脱了历史的审判和追究！





2006年夏，在北大荒博物馆留言。

当“知青文学”走过了展示伤痕、诉说苦难的阶段之后，它开始向纵深处反思知青自身——“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中，一切悲剧中所蕴涵的人性因素。如果知青能够正视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正视狂妄自大和胆怯懦弱，正视虚荣和野心，正视私欲和利己动机，知青便没有权利认为所有的错误和罪孽都是时代造成的；知青不仅仅是受害者，在受苦受害的同时，为了摆脱苦害，知青彼此间的残酷争斗，甚至波及到周围的人，直至互相心灵的严重戕害。当我们探寻悲剧的根源时，我们痛心地发现，原来知青与“文革”是互为因果的。恰恰是这一代人的行为和思想，维护并维持了旧日的体制；他们是悲剧的扮演者，其实也是剧中人之原型。

与此同时，“无悔”的颂歌却已飘扬为90年代的知青旗帜。

连“正视”都如此艰难，怎么会有“忏悔”意识生存的土壤呢？

何况，向谁“忏悔”？到了上帝和“人”都已经“死亡”的21世纪，还有一种绝对的精神原则，能够承担“忏悔”？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硬说“忏悔”似乎有些虚情假意、强加于人。“忏悔”的前提是觉悟，是自我认识；“忏悔”的作用是改错是超越自我——如果“忏悔”真的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自我审视一番行不行呢？就让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从头梳理一遍行不行呢？

这绝不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嘲弄和不恭。如果“我们”老三届人至今仍对自己当年曾经拥有的所谓“真诚”，抱着欣赏留恋的态度；对那种旷世愚昧和空前绝后的非人道行为，非但毫无认识甚至置若罔闻或姑息迁就；并且还以如此之价值观去教育子女——那么，“老三届”人便无可救药地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一块基石，迟早会被新世纪的掘进机无情地清理！





诚然，“老三届”人和“老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丧失了继续升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把汗水洒在了陌生的土地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扑火抗洪抢救集体财产，我们把知识传播到偏僻荒凉的山野乡村，为贫下中农子女教书治病；我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科学种田搞发明创造；许多人因超负荷劳动而留下终身疾病和伤残，有些女知青惨遭歹徒兽性的凌辱，更有一些人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广阔天地……如此巨大的付出之后，等待我们的却是返城后的无学历无技能无房无钱上有老下有小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病痛失业下岗的种种困扰和尴尬境地……

那是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所能为国家做出的最大牺牲了。

牺牲和奉献往往是无偿的，剩下的只是那一次次的“知青聚会”中，惺惺惜惺惺的互相理解、援助，还有惨淡的回忆。

但所有那些往日“辉煌的业绩”，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骄傲和慰藉吗？

历史从不以动机衡量功过，历史是很“势利”的，它只认得效果——用当下的语词来表达，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所谓的“社会效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恰恰是“老三届”的红卫兵们，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把城市红卫兵的野蛮作风和狂躁做派，带到了“广阔天地”之中。

“文革”之初，曾在各个阶层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从中央到地方，许多人不理解，响应者寥寥。但很快在自发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中，找到了最坚决的支持力量。当时的中学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吮吸着建国后极“左”意识形态的“乳汁”长大的，比起其他年龄段的各个阶层，他们极其缺少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人文传统教育，头脑中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色彩相当严重，对于领袖的召唤，可谓是一呼百应，招之即来。于是，伟大领袖亲自给红卫兵组织写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又数次大规模地接见全国红卫兵，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这才将“文革”之火点燃。紧接着，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砸古迹、揪斗“走资派”、冲击公检法、毁灭性地抄家打人、残害教师和一切“阶级敌人”，将全国各地的城市淹没在一片红海洋和红色恐怖之中。没有“红卫兵运动”作为“第一推动”，“文革”难以如此迅猛异常，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并向县城乡镇蔓延扩张。

然而，“文革”初期，全国的农村“文革”运动，远远“落后”于城市。“文革”的烈火之所以在后来“深入”地燃遍山野乡村的每个角落，这同1400万的“老三届”（包括那些铁杆红卫兵）上山下乡有着密切关系。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



乡运动，其现实的原因，在于“文革”中全国经济停滞，生产下降，为解决上千万中学生的就业安置问题，政府做出了这一“权宜之计”。于是，正处于“文革”巅峰状态的红卫兵小将们，借此将城市“文革”最激进最时髦的运动方式，一并带到了农村。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向农村，迅速成为农村“文革”的战斗队、宣传队、先锋队的骨干力量。最先到达内蒙古的一部分北京知青，不久便积极参与深挖“内人党”的运动，迫害致死许多干部和牧民，变成一支残酷整肃“内人党”的冲锋队。在后来的东北国营农场和边境地区，一部分“先进”知青也是四处煽风点火，动辄批判当地干部“右倾”，以反修防修之名，对“二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和“二毛子”（中苏混血儿）实行体罚和人身侮辱；在各地农村，知青向贫下中农“传授”和“灌输”种种极“左”的口号，迫害地富子弟，大搞阶级斗争，一时把农村搞得人心惶惶。在“继续革命”的口号下，批林批孔、重评《水浒》，以各种违反客观规律的所谓“新事物”的名义，迫使农村的“文革”轰轰烈烈地持续下去。

“文革”如果失去数千万“老三届”红卫兵和知青中激进分子的参与，是不可能形成如此巨大的“规模效应”的。“文革”之所以能够持续10年之久，知青中的原红卫兵们，起到了其他阶层难以起到的恶劣作用。所以说，这一代人是被“四人帮”充分利用和借助的政治力量。

也许会有“老三届”朋友委屈地说：“我没干！那不是我干的，和我没关系！”

是的，你没干，我也没干。那是路线和政策造成的，是时代的过错。但是，路线和政策是由无数的个体去实施去完成的——你作为那个集体中的一员，还能有什么光荣可言？至少你不应为此感到那么由衷的骄傲吧！

毕竟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可歌可泣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是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究竟是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自愿献身，还是成为某种需要的牺牲品，这之间有本质和天壤之别。

既然“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已被全面否定和逐步反省，那么，作为与“文革”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怎么能够逃脱干系呢？在“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祭日”即将到来之际，“知青”怎么就变成了一种值得发扬光大的“精神”？变成了无比光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一种辉煌的庆典？难道，在国家整体亏损的账册之外，“知青”竟然是一群可以单账另算的赢家吗？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效益”——



当时我国大部分农村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大量没有任何农业生产技能的知青落户农村，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加剧了农村的矛盾，产生了许多副作用。即便是土地面积可容纳大量知青的北大荒，也须加速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才能养活几十万知青大军。然而，知青在到达北大荒的第二年开始，农场就普遍开始亏损，吃返销粮。我所在的农场，1969年知青刚到，每顿吃的是大米饭，常有肉菜(是前劳改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劳动所获)。但从1970年开始，收获的粮食非但无力上交，仅仅只够维持全场知青几个月的生活。我们开始吃苞米面、小米、高粱米，然后是黑面……大片的水田依旧，连队年年都种水稻，但大米已成为过年过节的珍贵主食。后来的许多年中，农垦系统仍是全面亏损，粮食“上纲要”的连队极少，赢利的农场也极少，各农场几乎年年都以返销粮支撑着知青的身体。农场召开各种会议，一年到头反反复复的豪言壮语、最高理想只须归结成一句话：“打翻身仗，摘亏损帽。”但遗憾的是，知青们大返城离开农场的时候，大多数人吃的最后一顿饭，还是返销粮。

有人说，知青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这种说法真让知情者为之汗颜。在我看来，这是“未来时”而非“过去时”，是我们曾经立下的雄心壮志，而非已实现的梦想。曾有农场干部对我说，知青农场若是全体全年放假，即便不播种不开张，农场亏损的数字，都将比知青劳动所“损失”的效益要少得多。很多年里，我们开荒我们耕耘，我们大搞人海战术——小镰刀战胜康拜因——但在那片肥沃的土壤中，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收获。我们播下去的种子，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到底“贡献”了什么？而我们辛辛苦苦烧荒伐木垦植引水，却造成了如今三江平原的气候异常和部分土壤沙化……直到我们返城后，北大荒才被确定为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

那究竟是因为什么？

近40年过去了，我们至少应当能够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了吧？

面对历尽苦难的一代知青，我实在不忍心将以上如此残酷的事实——“实话实说”。但即使我不说，难道它就不存在了吗？

我写下我曾亲历的和亲见的八年北大荒，虽然，那仅仅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

为了这一代人先天的心灵缺损和后天的人为致残！

为了我内心深处永久的惭愧和隐痛！

张抗抗

1998年6月18日

2006年8月18日修订

目录 CONTENTS



001 自序

第一辑 离别杭州

002 西湖红海洋

010 “文革”中的杭州一中

023 我要去远方



001



第二辑 嵌于心灵的弹片

030 信号弹

033 管教

040 二劳改

048 批判会轮到我头上

052 瞭望塔

055 大江阴影

059 大字报

066 关于“自由”

071 大学梦破

076 匿名信

082 上学去

093 留在荒原上的坟

目录 CONTENTS



第三辑 苦中作乐

098 垄 沟

103 菜园子

108 菜 窖

111 水泡子



002



第四辑 写作之初

115 万能大葱

118 过 冬

123 林中记事

142 荒友们

152 处女作

157 探亲“大补”

162 《分界线》

175 后来……



第五辑 附录

180 回 乡

192 天上永远有星星

197 野 味

200 故乡在远方

203 选择的疑问

205 难忘小芹一家

208 十年黑土梦

210 最美的是北大荒

213 有关煤的闲聊



003

216 遗失的日记

223 管劳模和疯子

226 再教育之门

231 风过无痕

234 无法抚慰的岁月

237 重返黑土地

256 在怀旧中新生

259 后 记



第一辑 离别杭州

19岁那年，我们在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驱动下，义无反顾地辞别父母，离开了温暖的故乡杭州，去往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那究竟是因为什么？

1966年夏天到来的时候，连天空的飞鸟都格外焦躁。那几天，一群燕子总是在教室外面的屋檐下，没头没脑地胡撞乱窜。有一只灰燕子闯进了我们的教室，它惊慌失措地扑腾着翅膀，围着天花板的四角来回转圈，一次次咚咚地撞在玻璃窗上，却晕头转向地再也飞不出去。日光灯也被它撞得猛烈摇晃。

“破四旧”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那天中午，我们班的男生正在全力围剿那只燕子。他们关闭了所有的门窗，然后挥动着书包和笤帚，企图活捉那只燕子。燕子凄厉地叫着，从我们的头顶上惊恐地飞过，一次次钻过男生的胳膊和腋窝，机灵地逃脱。所以，他们直到最后也没有捉住那只燕子。后来有人喊道……



西湖红海洋

1966年夏天到来的时候，连天空的飞鸟都格外焦躁。那几天，一群燕子总是在教室外面的屋檐下，没头没脑地胡撞乱窜。有一只灰燕子闯进了我们的教室，它惊慌失措地扑腾着翅膀，围着天花板的四角来回转圈，一次次咚咚地撞在玻璃窗上，却晕头转向地再也飞不出去。日光灯也被它撞得猛烈摇晃。

“破四旧”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那天中午，我们班的男生正在全力围剿那只燕子。他们关闭了所有的门窗，然后挥动着书包和笤帚，企图活捉那只燕子。燕子凄厉地叫着，从我们的头顶上惊恐地飞过，一次次钻过男生的胳膊和腋窝，机灵地逃脱。所以，他们直到最后也没有捉住那只燕子。后来有人喊道：“燕子呢？那只燕子怎么不见了？”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

——那只燕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了，血肉模糊地躺在我们教室的地板上。小小的脑袋已经折断，琥珀似的眼珠子弹在玻璃上，哀伤地望着我们。雪白的墙壁上，留下了一串血迹，像一把剪刀。

男生们大口地喘着粗气，面面相觑。他们本来是想抓住那只燕子的，燕子却宁死不屈。那只可怜的燕子死于一场混战，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失手打死了它。

下午放学，我们灰溜溜地走过学校操场，西斜的阳光下，操场上跪着许多老头儿和老太太。他们从清晨就开始跪在那儿，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大大小小的包裹扔得满地都是。从老太太跪着的身后，露出两只粽子般尖尖的小脚，老头儿的头发都已经被剃得光光，头顶上结着一块块血痂，几只绿头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他们的脸上、胳膊上，都被花花绿绿的颜料打上了一个个大叉叉；他们跪在地上，哭天抢地苦苦求饶。围在四周的人，不停地往他们身上吐唾沫、扔垃圾。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矮个儿男生，笑嘻嘻地解下腰间的皮带，突然往他们的头上抽去，一边大口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围观的人惊叫着四散开去，鲜血从那个被打的老头儿的脑袋上喷泉一样地冒出来，顺着肮脏的衣领一直往下淌。我觉得一阵恶心，快快走开了。有人在我旁边悄悄地说：“这些人都是从外地被遣返原籍的地主和地主婆，红卫兵把他们从火车上拦截下来批斗，



1951年抗抗1岁，与外婆、父母在杭州。



1953年抗抗3岁时与妈妈、舅舅在杭州。

所以，停课一点儿也不使我感到沮丧，甚至还暗自有些幸灾乐祸。

爸爸妈妈担心的抄家的人始终没来。我整天在校园里逛来逛去，眼巴巴地望着那些干部子女们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在飞梭似的自行车上红光闪闪。参加红卫兵当然没有我的份儿，我惟一可做的就是去阅读礼堂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乎每个钟头都会有墨迹未干的新大字报，覆盖在其实还没变旧的大字报上。那些大字报都是同学批判老师的，揭发老师如何走白专道路、如何散布“封资修”思想等等。

过了几天，老师批判老师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有个高三年级的语文老师，被学生拖到礼堂的台上批斗，“打倒”这两个字还没有喊出来他就昏了过去；教导主任是个女的，也被剃了阴阳头。10月10日那天凌晨，有个女教师跳楼自杀，当时就死了……

那年秋天校园里的桂花，散发出一种咸腥的香味，我一闻就想呕吐。树上的枯叶一片片地落地，传来一种瓦片碎裂般的响声，掉在头顶上，令人一惊一乍。有一天，我悄悄地跑到妈妈的学校去，在教学楼和礼堂四周转了几圈，直到确实看清墙上的大字报里没有一张批判妈妈的，才溜回家去。那天妈妈兴致勃勃地问我：“你去大串联的事，手续办好了没有啊？”

我说：“哎呀妈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是不会给我开证明的。大串联怎么会轮到我呢？”

妈妈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去步行串联呢？步行总可以的吧？你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应该争取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呀！”

在“文革”最初的日子里，无论爸爸还是妈妈，都没有估计到即将来临的灾祸。他们以为自己早已经远离政治，只要收好了那些“文化”，就可以幸免于难。也许，“文革”之初的大民主，那种群众蜂拥而起反对官僚主义的激情，还给妈妈带来了一线希望。她每天都说服我去参加步行串联，她说她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正走在去天目山后方求学的公路上……

无论是地要的“文化”，还是我向往而又惧怕的“革命”——我们偏偏都没有弄明白，“文化革命”其实只不过是无数次“运动”以后的又一次“运动”，不同之处就在于这次“运动”“大”得空前绝后，“革命”革得史无前例。

当我终于带着在大串联途中抄录的一本本大字报底稿，带着衣服里藏匿的一身虱子，风尘仆仆地回到家的那天，我爸爸正弯腰站在街道俱乐部的台上，为街道里的那些“牛鬼蛇神”们“陪斗”。



年审干期间，结论为“托派嫌疑”、“特务嫌疑”而被开除党籍，调离省报。

“文革”开始前的十几年中，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申诉。

1965年，他从郊区果园劳动回到杭州后，仍然没有人来解决他的“问题”，他只好在街道的修建队当临时工。如果他到妈妈单位去问，说不定人家还要盘问他呢。爸爸想了想，点点头说：“那也好。你可小心啊，问清楚了赶紧回来。”

我穿过长长的小巷，那条路我很熟悉，小学里，我跟着妈妈整整走了6年。月亮出来了，是半个，毛茸茸地发红，像一只被大火烧焦的耳朵。

离那所中学还挺远，我就看见一股黑烟，如一条大蟒蛇，从学校的围墙上蹿起来。火光一闪一闪的，像是蟒蛇的舌头一吐一伸。我从侧门那儿溜了进去，听见有嘻嘻哈哈的笑声从操场那个方向传过来，还有什么东西被砸碎的乒兵声。

有一个男孩儿恶狠狠地喊道：“×××，你给老子出来！”又喊：“×××，你到楼上去，把老子的红宝书拿来！”

×××、×××都是老师的名字，他们不再称呼老师，而是直呼其名。

我躲在一棵梧桐树后面，看见许多人围着操场上的那堆火，正往火中一件一件地扔着漂亮的衣服。轻飘飘的丝绸在火光中飞起来，闪烁着孔雀羽毛一般绚丽的色彩。有个人喊：“这件丝棉袄不要烧了，留给老子自家穿，老子还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资产阶级的丝棉袄哩！”又是一声巨响，一只半人高的青花花瓶从楼上扔下来，在操场的石台上摔得粉碎，碎片蹦到我的脚边。一个苍老而嘶哑的声音号啕大哭，含糊不清的哭声好像在诉说着这只花瓶的来历。我从哭声的方向看到沙坑那儿跪着一个老头儿，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的木板，用一根细细的铁丝吊着，铁丝都嵌进他的皮肤里去了。我认识这个老头儿，他叫杜约瑟，妈妈说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原来是这所学校的前身——天主教会办的冯氏女中的校长。解放后，学校改了名，他就留在这个学校里当英文教师。据说，他会讲好几种外语呢。

他吃力地抬起头，朝楼上哭喊道：“你们不要摔了，这些古董，都是文物啊！你们要是喜欢，就拿回家去好了，千万不要摔碎呀……”

一个人走过去朝他重重地踢了一脚，他垂下头去；那个人又踢了他一脚，尖声尖气地喊：“起来！起来！统统都到健身房去，去把乒乓球桌给老子搬到操场上来，老子要在月光底下打乒乓球了……”

他们走开了，我穿过漆黑的走廊，绕到健身房那儿，躲在一块语录牌后面等着。整个教学楼的窗户都是黑洞洞的，妈妈到底在哪里呢？



1966年16岁的抗抗在杭州。



1968年冬，摄于杭州西湖保俶山顶。

胸口挂着木牌的人走过来，我飞快地跑到杜伯伯面前，急忙问他：“您看见我妈妈了吗？她是不是也被关起来了？”杜伯伯摘下眼镜把我看了一会儿，说：“你的妈妈是朱小玲吧？嗯，那不叫关起来，叫‘隔离审查’；嗯，‘隔离’就是实行革命群众专政……”

我死死地抓住他的袖子问：“那我妈妈隔离在什么地方呀？”

“你快走开，让革命小将看见了，大家都要吃苦头了。”他拼命地摇头。

“……假如你看见我妈妈……”我还想对他说什么，突然，一记重重的拳头落在我肩膀上。一个尖细的嗓音吼道：“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想同牛鬼蛇神搞特务活动啊？还不快滚出去！”

月光下，面前这个头发黄黄的男孩子，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茸毛，两只清澈